

战后几个主要的「现代资本主义论」(陈明忠)

[信息来源:]

[上传时间: 2006-09-07]

关闭窗口

战后几个主要的「现代资本主义论」

陈明忠

<http://www.xiachao.org.tw/?act=page&repno=372>

前言

《资本论》的写作，是马克思以英国的经验作为理论论述的例证，以资本主义从重商主义阶段到自由主义阶段的发展过程作为基础，其中又以产业资本占统治地位的自由主义阶段作为主轴，考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他有系统的诠释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和历史特质，从而确立其作为科学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的地位。

随着资本的扩张和积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内在矛盾的表现形式，在历史的过程中不断地进行阶段性的进化。因此，以19世纪中叶英国一地经验对象所写成的资本论，其中某些命题展现出历史的局限性、在资本主义后期发展的阶段上丧失其时代的适用性，乃极为正常的事情。19世纪末，一方面由于较为落后的美国与德国迅速地工业化；另一方面，包括英国在内的资本主义由于构造上的变化展现出不同的样貌。《资本论》所规定的部分命题，无法直接地用来分析现状的问题才被暴露出来。

E.Bernstein的修正主义，就是产生在这个基础上的谬误，他首先对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提出质疑，随后提出从根本上修正或全盘放弃马克思主义及其理论的主张。

相反的，R.Hilferding与列宁积极地继承马克思的观点，并进一步研究垄断资本体的形成、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之间的关系变化、景气循环的规律、资本输出的规模以及国家经济政策所能扮演的角色等命题，从而架构出「金融资本论」、「帝国主义论」等全新的理论，并在这个新的架构上，重新分析并诠释E.Bernstein所指陈的各个现象，而不是将《资本论》原有的命题直接套用在新的历史条件上。这就是说，R.Hilferding与列宁在分析《资本论》中没有提及也无法提及由特定的历史条件所形成的各个现象时，是以适用时期有限却又具有一定抽象意义的「金融资本论」、「帝国主义论」等新理论来进行诠释。也就是说，他们以《资本论》中的一般理论为基础，抽出针对特定历史条件下的资本主义现象的「阶段论」，再将其当作联系一般理论与具体分析（现状分析）的中间桥梁，从而在不背离马克思主义的情况下，诠释资本主义在新的发展阶段中所呈现出来的各个现象。

资本主义的构造在量变的过程中，是以阶段性进化的方式来进行，所以分析资本主义的复杂运动时，必须以中介理论来联系一般理论及具体分析，否则具体分析就会变成单纯的「历史记述」。

所以，日本托派主要学者佐佐木力教授也说：「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期，马克思主义者陷入混乱之中。这是因为针对近代资本主义提出批判性分析方法的马克思，其生前所看到的『自由竞争之王国』在此时已经产生了新的变貌，而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还没找到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指导方针，来面对将要揭幕的垄断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时代，因此产生了迷乱。」

对『自由竞争之王国』时代有效的概念，简单地说就是布尔乔亚阶级和普罗阶级之间的

阶级对立。但是，现在却需要另一个国际主义的分析工具，给世纪转换期间，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迷乱，打一支清醒剂。首先是针对资本主义的新时代提出明确的历史展望的，是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

... 战后托派的重要指导者E.Mandel，将战后资本主义或战后帝国主义视为资本主义体制的『第三时代』的阶段。他1972年出版的主要著作《晚期资本主义》（Late Capitalism），德国与英国版都是用这个名称，但法文版却是《资本主义的第三时代》。E.Mandel在德文版序言说：『有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才有意义。他的《晚期资本主义》是列宁《帝国主义论》的后续理论。』

「资本论」和「帝国主义论」的这种辩证关系，就是作为资本主义一般理论的「资本论」和作为中介理论的「帝国主义论」的辩证关系。

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就是一个典型的中介理论。「帝国主义论」着重于分析19世纪末到第一次世界大战间「古典帝国主义」时期的资本主义。在这时期，重工业部门确立了以股份公司为形式的大规模生产体制。就这一点而言，资本主义似乎已经形成了到现在还存在着的新面貌；但是，如果考察这时期以资本输出和殖民地再分割为特征的资本积累方式，则古典帝国主义时期的资本主义就是：垄断资本为了解决因限制生产和投资所产生的矛盾而导致金融资本相互对立、在特殊历史条件下所形成的体系。

后者与二次大战后的资本主义有所差异。战后资本主义成功地由外向型积累转为内向型资本积累，并且形成了以内部成长与生产性上升为互相促进机制，从而得以继续其高度积累的体系。

因此，在进行对战后经济成长过程的理论探讨时，建立在垄断资本限制生产和投资的基础上，主张资本主义具有经济停滞化倾向的「古典帝国主义论」，就丧失了某些说服力。

资本主义的进化，在不同的阶段呈现不同的特性。19世纪以后的资本主义，其资本与生产的结合型态以及其资本积累的方式，迄今为止已经经过了数次的变化。所以在研究资本主义的发展时，如果不想让其成为单纯的「历史记述」，在不同的阶段就必须拥有不同的中介理论。

因此，本文的目的就在于介绍二次大战后，由左翼经济学家就资本主义的阶段性发展所提出的几个中介理论，以提供给岛内的朋友参考。

一、从「全盘危机论」到「现代资本主义论」

从战后的危机到重建的十年间，马克思主义正统派分析现代资本主义架构的理论代表就是「全盘危机论」。全盘危机论被认为是斯大林继承了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各种看法，并在这个基础上加以发展的理论。例如，苏联的《经济学教科书》（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出版）说：「资本主义的全盘危机的特征如下：即，世界分裂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这两种体制之间进行着斗争；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体制陷入危机，市场发生严重问题，因此企业发生设备的慢性闲置以及慢性的大量失业」。该书又说：「资本主义的全盘危机构成帝国主义时代的一个部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苏联建国成为全盘危机的第一阶段，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东欧及亚洲人民民主主义诸国脱离资本主义体制，因而产生全盘危机的第二个阶段...。」

这种全盘危机论，基本上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大众的生活水平受到压抑，因而产生生产过剩恐慌；加之，社会主义诸国脱离世界市场，同时殖民地制度也发生危机。所以资本主义世界难于避免严重的市场问题和慢性经济危机。

当然，这种主张有：以苏联为中心的社会主义集团的安定成长来凸显资本主义世界的危机状态，因而藉以强调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政治意涵。

就世界经济的动向而言，一次大战后的资本主义，由于社会主义国家的成立和社会主义集团的扩大，使其统治领域狭窄化，因而令人认为世界史已进入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所以在两次大战之间，尤其是1930年代以及二次大战后的混乱时期，全盘危机论确实具有相当程度的说服力。

不过全盘危机论无法说明的是：虽然世界市场比从前狭窄化，但从50年代到60年代的世界资本主义，透过资本积累扩大其内部市场，因而达成相对安定的成长过程这个事实。这就

是说，1950年代以后，以美国为中心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持续性经济成长，就其规模和持续性来说，无论如何是无法由全盘危机理论来说明的。因此，从1960年代开始，出现了种种现代资本主义论或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论，用以诠释现代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够继续成长的机制，以及国家所扮演的角色的增大。这些理论的出现，也是因应经过理论内部精密化之后，凯恩斯主义成为欧美经济政策运用的基准，并且展现出「表面」上成功的时期。

二、现代资本主义论和凯恩斯政策

(1) J.Strachey: 《Contemporary Capitalism》(1956)

《The End of Empire》(1959)

在欧美，较早承认凯恩斯政策的有效性，因而意图重新构筑马克思主义现代资本主义论的是J.Strachey的「当代资本主义」(Contemporary Capitalism)。J.Strachey肯定「全盘危机论」的理论基础，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大众的贫穷化是不可避免的，而且由于垄断资本的限制而变本加厉；同时也使商品的过剩生产慢性化。

但他也主张：在现代的资本主义，由于借助「政治民主主义」来对抗垄断企业的经济压力，限制了利润动机，推行凯恩斯的景气调整政策，致使扩大所得的再分配、公有化以及福利政策的经济体制已然成形。因此，如果再进一步往这个方向发展，现代资本主义就很可能「民主地」改变为社会主义。

他在《帝国的终结》(The End of Empire)一书中说道：在这种变化过程中，可以消除一向由于商品的生产过剩而必然产生的资本输出和帝国主义扩张。所以二次大战以后，帝国主义大致上已消失，同时透过对落后国家的经济援助，产生了扩大民主主义关系的情况。

然而，Strachey的现代资本主义论，是以大战后在工党执政下的英国内阁所实现的高就业率和高福利的经济过程为基础，然后将其抽象地推演而构成的。他只强调凯恩斯政策有效的一面，而没有指出其属于改良主义，因而具有局限性的资本主义本质的另外一面。所以他的主张，可以说是较接近于E.Bernstein的修正主义。

其实，就作为其理论基础的英国政治、经济情况而言，国有化的扩大只不过是政府对赤字企业的救济性收购而已，而先进国家和后进国家之间的关系，实际上与实现经济民主主义的方向渐行渐远。

另外，由于Strachey也将「独、寡占→抑制投资→经济停滞化」当作现代资本主义在经济上的基本趋向，因此他也和「全盘危机论」一样，无法解释战后以美国为中心的资本主义，其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在经济上的意义，也没有将这些事实成为他理论的一部份。

(2) P. A. Baran和P. M. Sweezy: 《Monopoly Capital - an essay on the

American economic and social order》

Baran和Sweezy两人在其合着的《垄断资本》一书中强调：巨大的产业垄断资本虽然回避价格竞争，却在非价格竞争方面致力于提高生产力、减少生产费用。由于生产费用的降低，不断扩大产业垄断资本的经济剩余，却由于为了避免其过剩产能再行增加，导致其扩大的经济剩余无法在产业投资上找到充分的出路。所以，垄断资本主义在本质上具有陷入「慢性不景气泥沼」的内在趋势。

虽然如此，现代资本主义体制，除了大企业为了促进销路浪费了大量的金钱之外，更由于政府的军国主义性支出的增加，从而吸收其过剩的经济剩余，维持了就业水平，致使先进国家的劳动阶级远离革命（所以他们认为，社会主义只有透过后进国家的独立运动或革命战争，才有希望实现）。

Baran和Sweezy两人都承认，垄断资本所支配的战后现代资本主义，促使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但是，他们同时也指出了反动的军国主义性支出的扩大、城市过度密集和荒废、道德规范的衰退等现象，进而批判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所扮演角色的历史局限性。

Baran和Sweezy两人虽然都批判现代资本主义的颓废性，但却也肯定国家支出的增加吸收了过剩的经济剩余，因而维持就业水平。就这一点而言，他们都无法避免肯定凯恩斯财政政策在就业问题上的有效性。

这种认识，和他们的「方法论」有关，他们试图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1960年代的美国资本主义特殊的历史经验中抽象出来，使其一般化而形成现代资本主义的一般理论。

《资本论》将资本主义视为一个历史体系，指出其基本构造的特征，也就是矛盾的性质、矛盾发展的方向性和历史的局限性等等，构成了资本主义一般理论的架构。换言之，资本主义具有萌芽期、成长期和衰退期的不同阶段，而《资本论》虽然以资本主义在19世纪的成长期为中心，却掌握整个世界资本主义全面发展阶段的资本运动原理的体系。但Baran和Sweezy却认为：《资本论》不过是从19世纪英国的经济情况抽象出来的，有关「竞争性资本主义体制」的理论而已。因此，现在需要以研究资本主义发展最先进的美国为基础，来建构「垄断资本主义体制」的理论。所以他们的理论是：将战后到60年代这一段特殊时期中，美国面对「陷入慢性不景气的泥沼」之现实的处理方式一般化，却将它和支持其处理方式的具体的历史条件切断而形成。因此不仅在主观上推测欧洲、日本的资本主义也必定会跟着美国的轨道发展，同时也欠缺了伴随着世界市场构造的变移，进而研究这些国家的金融资本发展的特性、互相之间的关连性等观点。于是到了1970年代的经济危机后，其理论和现实之间就无法整合而丧失其理论基础。

一般以为，二次大战后的资本主义，由于有效地运用凯恩斯的金融、财政政策而避免了恐慌，因而维持了持续性的就业安定和所得上升。就1950年代，尤其是就60年代先进国家的持续性成长的过程而言，这种认识似乎颇符合现实情况。例如：在美国，'53~'54年、'57~'58年、'60~'61年以及'69~'70年虽有景气的衰退，但是并没有恶化而且在短期内就被克服。尤其是60年代，在甘乃迪、詹森两位总统主政下，由于采用凯恩斯主义政策，资本主义似乎已经形成了足以达成充分就业和经济成长的体制。这种认识和经济成长的事实，影响了当时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的「现代资本主义论」。Baran和Sweezy的《垄断资本》一书，就是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例子--他们都承认资本主义经济发生危机具有其内在的必然性，但他们却也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是，国家的特殊机能可以防止或吸收恐慌的发生或生产过剩的危机。

其实，就1930年代的恐慌而言，凯恩斯政策并没有成功。美国在执行所谓「新政」(New Deal)后，1937年的失业人口仍然高达770万，而且37年秋天到38年，也出现了严重的恐慌并造成失业人数的激增。这种现象的解除，是因为到了二次世界大战后，为了对抗社会主义，美国对外进行军事、经济援助，维持庞大常备军的开支以及韩战、越战的军事冲突的扩大，形成了以通货膨胀为基础的财政膨胀政策，从而在世界范围上的资本主义，也以通货膨胀为手段维持相对的安定性。这就是说，凯恩斯的景气调节政策，表现在「新政」上并没有获得成功，反而是在战后为了对抗社会主义而扩大军事支出和推行福利政策后，成为所谓「福特主义」效果的副产品而达到表面的成功。再具体的说，战后美国的高就业率，并不能证明凯恩斯的景气调整理论和政策本身的正确性和成功，而是为了对抗社会主义为目的的军事、福利消费和因「福特主义」而扩大的有效需求，吸收、缓和了起因于资本过剩的不景气压力而奏效。所以，当时的马克思学者之所以受到凯恩斯的影响，其实是起因于他们对凯恩斯政策效果的误判。

(3) 「社会化」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论：

K.Zieschang:《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若干理论问题》(1957)

今井则义:《日本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1960)

井汲卓一:《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论》(1971)

二次世界大战后，因为国家介入资本主义经济，在苏联和东欧，继「全盘危机论」之后出现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论」。其中东德的K.Zieschang，为了将之与古典的帝国主义阶段区分，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规定为：「为了适应生产力的新发展而形成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一个发展阶段」，因而引发激烈的讨论。

Zieschang不认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全盘危机的产物，而是资本主义在历史上为了适应生产力的「社会化」，生产关系也发生「社会化」的现象。这就是说，他不以政治因素而改以经济因素来说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本质。更具体的说，Zieschang认为：资本主义为了因应生产力的「社会化」，其生产关系也不得不「社会化」--从个人资本发展为股份资

本，更由于投资规模的巨大化，为了招募资本和确保市场，形成了国家对经济事务的介入。如此形成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虽不能创造市场使景气繁荣永久化，但是由于国家进行所得再分配以及生产调整，产生了使生产和市场发展的新条件，因而大大的影响了景气。

Zieschang的理论是「想」依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说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因应生产力的发展而使「现代国家」增强其在经济上所扮演的角色（包括采用凯恩斯政策在内）。

但依照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生产关系因应生产力发展而产生的变化，是属于下层构造的发展，而不是法律、政治等上层建筑的变化。所以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国家在经济上角色的增大，并不属于生产关系的发展。

这就是说，Zieschang的理论混淆了上层建筑和下层构造之间的区别，使生产关系的定义暧昧化，是唯物史观的误用或过度解释。但是，日本学者今井则义、井汲卓一等人，不仅支持Zieschang的理论，更相对于「政治国家」或「做为上层建筑的国家」，而主张「经济国家」或「作为下层构造的国家」等理论，成为所谓的「构造改革路线」的理论基础，在日本发挥一定的影响力。

他们不仅不正确的使用马克思生产关系的概念，也把现代资本主义之下，国家机能的增强，单纯的归因于生产力的巨大化，缺乏正确的认识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社会主义国家的成立和发展，以及经济恐慌等具体历史事实的影响，因而逐渐消失其影响力。

(4) 大内力：「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论」(1970)

大内力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论」是为了克服Zieschang和今井、井汲等人的理论缺点而发展出来的。

在这本书中，大内主张：以一次世界大战的俄罗斯革命为契机，世界史已经进入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期。而在这个过渡期的资本主义、在大恐慌的过程中，为了应付体制和危机而增强国家的职能，因而转化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本质在于：他形成了在货币管理制度下，以通货膨胀政策来抑制实质工资的上升，以解决和预防因资本的过度积累而产生恐慌的机制。

大内认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不同于一次大战前的古典帝国主义阶段，所以国家为了回避恐慌而采取的财政、金融政策也有所不同。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的国家机能的特征在于：一次大战后，资本主义进入过渡期的全盘危机。更由于30年代的大恐慌，资本主义体制的危机已经成为现实化和内在化。同时由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放弃了金本位制而采用货币管理制度。为了回避恐慌，这些国家采行通货膨胀政策--因为，资本的过剩积累将导致工资上升，一旦面临发生恐慌的临界点（Critical Point）时，通货膨胀不但可以抑制实质工资的上升，而且可以使其降低。

大内的理论，和1960年代主要的现代资本主义论或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论一样，都没有脱离一个局限。那就是：把从战后重建时期到60年代的凯恩斯通货膨胀政策「外表上」的成功，当作攸关现代资本主义本质的问题，而将其夸大地一般化后，纳入马克思理论的架构内的毛病。

1970年代以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发生和进展，呈显了凯恩斯主义的局限性。因此肯定凯恩斯主义的有效性，并将其一般化而发展出来的种种现代资本主义论或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论，本身也面临危机。

于是经过批判和反省之后，从各种角度重新进行现代资本主义分析的工作开始活泼化。

三、现代资本主义理论的新发展

从60年代末到70年代，在欧美资本主义国家日渐抬头的马克思学派，尖锐地质疑当时主宰着欧美学界的主流经济学派，并对作为主流经济学的一支的凯恩斯学派，进行严厉的批判性考察。

战后，以P.萨缪尔森为首的主流经济学思想（广义的新古典综合学派，Neo-classical synthesis），绝对化资本主义体制，并在这个狭窄的架构中，将传统的庸俗经济学视为是研究

个量问题的微观经济学，把凯恩斯主义当成是考察总量问题的宏观经济学，并认为两种理论是相辅相成，可以纳入同一个经济体系之中。他们认为：

1. 就宏观而论，凯恩斯的财政、金融政策可以达到充分就业的目的。
2. 就微观来说，透过市场的价格机制，可以实现资源所得的合理分配。

但是在60年代以后，一方面由于通货膨胀不断恶化；一方面由于马克思主义以及新李嘉图学派的学者的检验，以边际效用论为根据的价格和资本理论的内部一贯性开始受到质疑，其思想的局限性也遭遇批判。特别是在70年代西方世界陷入「滞膨危机」（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并存的危机）之后，凯恩斯理论的地位终于一落千丈。这就是说，在战后相对安定的时期中，支配着以美国为中心的资本主义世界的布尔乔亚和谐思想的信赖感，已经开始崩溃。

欧美的马克思学派，一方面对广义的新古典经济学进行批判，另一方面也根据马克思理论，分析近期的经济危机。其中最值得重视的特征是：在60年代发挥重要影响力的「现代资本主义论」或「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论」的理论体系，并没有被继承下来作为经济分析的架构。取而代之的是，回归到马克思主义的危机理论，强调：现代的资本主义无法避免内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以及这种矛盾的显现。也就是说，以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重新分析凯恩斯政策产生破绽的原因和过程。例如，Sweezy也说：「在一定的历史脉动中，资本主义对于无限制生产扩大的冲动会发作，而偶而也会出现小小的后退……但这种时期并不能永远继续下去。无限制生产扩大的趋势和限制消费之间的基本矛盾会逐渐发挥其威力。」Sweezy在此重新的肯定了发生经济危机的必然性，也就是说，重新修订了他在《垄断资本》一书中所持的论点。

再次兴起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大都将经济危机的原因归咎于利润率下降趋势，这是产生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内部的必然趋势，其理论基础是：伴随着资本积累必然产生资本有机组成的高度化或工资上升，将导致利润率下降，从而成为恐慌必然性的根据。

例如，D.S.Yaffe在《The Marxian Theory of Crisis, Capital and the State》(1972)以及P. Bullock & D.S.Yaffe在《Inflation, the crisis and the post-war Boom》(1975)等书中指出：马克思根据资本有机组成的上升而主张「利润率下降趋势的规律」，证明了经济恐慌的必然性。而战后的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对市场经济的介入和通货膨胀政策，不过是意图缓和这个规律的作用而已。但是，国家的经济政策永远无法阻挡这个规律的彰显，因此便出现了70年代的世界性经济危机。

E. Mandel的《晚期资本主义》(1972)在分析现代资本主义的危机时，也将由于资本有机组成上升所导致的利润率下降规律，作为主要的课题。

还有A. Glyn and B. Sutcliffe《British Capitalism, Worker and profit squeeze》(1972)也认为，最近英国的资本主义危机的主要原因，在于工会要求提高工资的压力，使利润分配率或剩余价值率降低。

此外，A. Glyn和H. Horrison、P. Armstrong等人在《British Economic Disaster》(1980)和《Capitalism since 1945》(1991)等书中也主张，资本相对于人口的过剩积累与工资的上升压力将会降低利润率。

由此可见，许多近期的欧美现代资本主义论，开始以马克思的危机理论作为基础来分析1970年以后的经济危机。不过这些危机理论，并没有对「全盘危机论」、「现代资本主义论」以及「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论」所强调的：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阵营的对抗关系、战后资本主义充分就业等原因，如何引起资本积累的基本困难，因而引发此一时期的经济危机等问题进行讨论，而只是将70年代的经济危机，归因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内部矛盾及其显现。所以，就资本主义分析而言，这些危机理论，就具有其片面性而显得不够充分。

因此，要理解支撑着战后资本主义体系到60年代为止的相对安定和该时期凯恩斯政策表面上成功的历史条件，以及这些历史条件又如何丧失等问题，必须从资本过剩的理论入手。否则，难以避免陷入将资本主义某一时期的发展固定化后，再加以一般化的缺点。因为，绝对不能单纯的将战后资本主义的高度成长以及1973年后转变为世界性的长期萧条，仅仅归因于操作凯恩斯政策的成功与失败而已。

四、资本积累的社会结构论(Theory of Social Structure of Accumulation, SSA)
和调节学派(Regulation Theory, RT.)

D.M. Golden, R. Edwards, M. Reich: 《The Historical Transformation of Labor in the United State》(1982)

S. Bowles: 《The Production Process in Competitive Economy》(1985)

S. Bowles & H. Gintis: 《New Microfoundation for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apitalism》(1990)

M. Aglietta: 《The Regulation Theory of Capitalism》(1976)

在70年代马克思理论复兴期的讨论中，西方马克思学派中出现了在理论和方法上拥有明确特征的学派，也就是重视社会以及各种制度对决定积累动向的重要性，尤其是特别重视在资本主义下劳动过程的历史特性及其变化的现代资本主义论。那就是美国的「资本积累的社会结构论」(SSA)和出现于法国然后再广泛流传的「调节学派」(R.T.)。

这两派的出现，都受到 Braverman在1974年出版的《劳动与垄断资本》(Labor and Monopoly)的影响。Braverman继承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劳动过程、分工、协作、机器大工业等命题的考察，进一步对20世纪在美国的资本主义下，由泰勒与福特所发展出来的「科学的劳务管理」进行分析，并据此指出劳动的去技术化和均质化是「科学的劳务管理」一贯的内容。他的研究促进日后的西方马克思学派对劳动过程、经营组织的扩大进行更深入的研究，而SSA与R.T.就是这些研究的一环。

(1) 资本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 (SSA) :

S. Bowles, H. Gintis, T. Weisskopf, D.M. Golden, R. Edwards等人就是较为著名的SSA派学者，而Golden, Edwards和M. Reich共着的《美国资本主义和劳动》(The Historical Transformation of Labor in the United State, 1982.)就是其典型著作。

Golden等人认为，对于「资本积累的社会结构」的考察，是分析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所不可或缺的。「资本积累的社会结构」是由影响资本积累过程的所有制度所构成。尤其是国家透过货币、信用制度、财政政策、工会的合法化等措施而介入市场，以及透过工会、政党、选举制度等阶级斗争的手段来干预经济事务。资本的积累依存于各种社会制度的安定性。

从SSA的观点来分析美国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历史，可以看出三个截然不同的局面：

1/18世纪20年代到19世纪末的「劳动的初期无产阶级化」时期：这个时期，劳动力有多种供给来源，劳动者尚能控制劳动过程，劳动作业难以标准化，资本或其代理人只能依靠个别的、恣意性的劳务管理。1880年以后，这种积累的社会构造遇到瓶颈，企业利润减少而面临危机。

2/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前期的积累问题获得解决，进入「劳动的均质化」时期。在这个时期，大型企业在采用机械性作业方式、大量启用以监督劳工为职务的「组长」、减少对熟练劳工的依赖等情形下，形成了劳动者均质化和强制劳动体制。这就是Braverman所说的劳动均质化的时期。但其苛刻的劳动强制体制，提高了劳动者的离职率，进而在30年代大恐慌的过程中，成为劳动者抗议的焦点而不得不衰退。

3/二次大战后的美国资本主义，发展了属于第三种局面的「劳动区分化」时期：在这时期，虽然小企业仍然采用「强制劳动体制」，但是大企业则因为工会斗争的影响，发展出「结构性内部劳务管理体系」，有系统的区分了各种职务，并依照不同的职务使其形成不同的技术，从而扩大了主管与其下属职务之间的差距。这种双重区分化，有效地利用人种和性别的差异而扩大进行，因而形成资本积累的社会构造。

在各个历史阶段中，以劳工管理方式为基础的「资本积累的社会结构」，产生经济活动的长期波动。亦即，长期波动的扩张期，是在有利于资本积累的「社会结构」的形成和安定下，不断的扩大其生产投资和经济活动，一直到面临新的局限为止。然后，为了因应这种局限，产生转换各种制度条件的需要，经济波动开始进入不景气期。

根据SAA学派的分析，领导战后世界资本主义的美国资本主义的特征是：以采用「劳动区分化」的美国式劳务管理方式为基础，以凯恩斯主义的财政、金融政策为外部框架，所发展

出来的资本主义体制。1970年代以后的经济危机，便是发生在这个「资本积累的社会结构」遇到瓶颈而需要重整的过程中。所以，这种美国式的劳务管理方式，受到反对人种差别、反对性别歧视的运动以及日本式的劳务管理的影响，开始进行职务区分的整理统合及其弹性运用，以便促使产业重建。

(2) 调节学派理论 (Regulation Theory, R.T.)

M. Aglietta的《资本主义的调节理论》一书出版后，经过R. Boyer, A. Lipietz, 和B. Coriat等法国马克思经济学者活泼的诠释研究后，在国际学术上逐渐受到重视。

调整(Regulation)是针对新古典学派的「一般均衡」的概念，认为：社会关系具有矛盾和对立。但是尽管矛盾有其对立和斗争的一面，却也有其互为条件、互相渗透和互相依存的另一面，因此，社会关系在一定期间内会维持安定和再生产。换言之，「调整」一辞所表现的是，社会关系中对立面和统一面的紧张关系。调整学派所要考察的命题是：「社会关系必定具有矛盾性，因此如何透过这个矛盾性来再产生社会关系的统一性。」

所以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动态，并非只是市场现象，而是更广泛地受到各种社会制度制约的积累体制。积累体制不仅把货币制度、劳资关系、竞争、国家、国际关系等各种制度收纳在内，更透过个人与各个集团的特定意识和行动的媒介而形成调节方式。所以调整学派也吸收了A. Gramsci「改革资本主义体制时，要重视社会上各种制度与意识形态所扮演的角色」的主张。

调整学派从这个观点出发，整理出在资本主义发展史中所产生的主要积累体制的变化：即，19世纪的资本主义，依靠不以生产力持续上升为条件的「外延性积累体制」，以延长劳动时间、增加雇佣劳动人数为手段，来增加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到了20世纪的以后，资本主义转而依靠以持续提高生产力为条件、扩大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为主的「内生性积累体制」。不过这种「内生性的积累体制」由于缺乏大量的消费市场，生产与消费之间无法整合，因而出现了30年代的经济大恐慌。

二次大战以后的资本主义，以「依照生产力的上升比例来增加实质工资」为内容的协调性社会契约为基础，形成具有「大量消费的内生性积累体制」，也就是所谓的「福特主义」（由于高生产力、高工资而扩大有效需求的积累结构）。这种积累体制虽然实现了高度的经济成长，不过由于科技进步遇到瓶颈，以及所得分配的矛盾而出现困境，因此带来了1970年以后的经济危机。

由此可见，SSA学派和RT学派之间，拥有许多共同的问题意识。但是，RT学派的特征在于：他们的关心集中在属于宏观经济的有效需要的动态发展上，主张战后资本主义高度成长的秘密，在于：从社会上、制度上保障了实质工资能够依照生产力提高的比率来增加，也就是从资本积累的内部不断扩大有效需求的「福特主义」的形成。

虽然，SSA学派与RT学派都将研究重点放在各种社会制度的变化上；但是，他们的理论关怀也涉及到了属于宏观与微观之间的MEZZO的范畴，包括劳务管理等企业经营之内部制度的变化。也就是说，他们把从国际关系、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以致于到属于MEZZO分野的劳务管理，都当作理论考察的对象，而有体系的诠释了资本积累的社会结构及其调节逻辑。

不过，SSA学派与RT学派的理论，仍有一些有待商榷的地方：

首先，部分SSA与RT的理论家，因过度关心现代资本主义各种制度的作用及其调节方式，而忽视了《资本论》中有关资本主义市场的原理性考察，因而认为在经济学上不需要「劳动价值理论」与「剩余价值学说」，甚至质疑研究资本主义原理的一般理论的必要性，并且认为将《资本论》视为是资本主义的一般理论的看法，其实是「19世纪和自由竞争的特权化」。例如，日本的RT代表性理论家山田锐夫就曾说过：「把资本主义的变貌，当作『原理表现形式的变化』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需要的是修正原理论或再构造经济的时候了。」等等。换言之，他们意图将他们的中介理论提高到「显现于资本主义所有发展阶段」的层次，进一步取代《资本论》的地位。

其次，一次大战后，资本主义的发展一方面受到世界战争的影响，一方面则是为了对抗社会主义的内、外势力，其体制的进化自然不能只从资本积累的内在逻辑来说明。但是SSA学派与RT学派，易将原理论与帝国主义论等视为「过时」的理论而予以抛弃，并且忽略或轻视

二次大战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冲击，也忽略了冷战结构以及为了对抗社会主义而采用的充分就业政策和福利国家化的意义。

其实，福特主义的「劳资妥协」之所以能够制度化，乃是以下列四个因素为条件，才成为可能：

1. 资本主义的构造变化，将资本与劳动力集中于巨大的垄断资本（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
2. 美国实施New Deal经济政策；
3. 由于在二次世界大战的协力中，劳动阶级的势力显著提升；
4. 战后的冷战结构也有助于福特主义的推行。

但是在RT的文献中，却很难发现有关冷战的军事对峙和越战对此一时期资本主义持续成长的影响的研究。

再则，他们虽然重视劳务管理制度与调节方式对资本积累的作用，但是并没有充分注意到，该时期主导性产业的性质及其所扮演的角色意义——战后的劳动区分化和福特主义之所以能够形成，是由于家用电器、汽车等耐久性消费品的大量生产所致。

生产关系的历史性格与属于上层建筑的各种制度，对生产力发展的方向、内容、速度当然具有重要的影响力。但就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而言，也不应该忽视主导性产业的性质及其积累方式，对提高生产力的具体影响。也就是说，各种社会制度的作用和调节方式，对资本的积累当然有所影响，但是为了了解其具体的影响，也应该考虑主导性产业的性质及其技术特性的变化。

SSA学派和RT学派，都关心资本积累的社会结构与调节方式，如何在高度成长时期以及随后的危机与重整时期产生变化。但是，对于成为高度成长原因的社会结构与调节方式，为何到了70年代初期就陷入机能不足而产生经济危机，则没有做充分的分析。例如，当技术进步遇到瓶颈的时候，从前用劳资协调的方式来处理生产力与实质工资的调整，现在却不再发挥作用？对于这个问题，上述两者都没有做过充分的分析。

、北原勇：「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论

垄断资本主义的理论(1977)

经济原论（1980）

现代资本主义的所有和决定(1984)

20世纪末的资本主义（1994）

如何看待现代资本主义（合着，1995）

(1)三层理论体系的特征

「资本主义的一般理论」、「垄断资本主义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论」这三种具有不同的研究对象、理论层次和性格的理论，必须经过整合与重组之后，才能成为分析现代资本主义的武器。

1/资本主义的一般理论

现代资本主义既然是属于资本主义的范畴，「资本主义的一般理论」所掌握的一般法则，仍然贯彻在现代资本主义的整个体系中，而「资本论」，基本上就是资本主义的「一般理论」。

「资本论」将资本主义视为一个历史的经济体系，指出其基本结构的特征，也就是其矛盾的性质、矛盾发展的规律以及其历史的局限性，从而形成资本主义一般理论的架构。但是资本论是一部未完成的著作，自然会受到时代的制约，因而作为目前还在发展的现代资本主义的一般理论，尚有不足之处。所以，应该以「资本论」为基础，将其研究的对象扩大到现代，进一步形成「现代资本主义的一般理论」。

由于资本主义的经济规律必须透过「竞争的全面性支配」的媒介和保证，才能够贯彻并发挥作用。所以在构筑资本主义的一般理论时，必须重视经济规律的贯彻与竞争之间的关系。因此，如后所述，必须从垄断资本的成立、国家对经济事务的介入来掌握资本主义的阶

段性变貌。

2/. 垄断资本主义的理论

从19世纪末起，资本主义就进入垄断阶段而一直持续到现在。在这个阶段中，「竞争的全面性支配」的结构作用丧失。但是，「竞争」既作为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基本属性，在进入垄断资本主义时期之后也不会改变，只是在经济的中枢部分，由于少数的大型垄断资本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受到限制而已。

所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结构特征在于：「垄断的支配以及垄断和竞争之间的纠缠」。在这个阶段中，部分「资本主义的一般规律」因为受制于这个结构而无法贯彻，从而产生新的变貌。这就是说，垄断价格的形成致使利润率在垄断资本之间平准化，投资行动严重地受到市场情况的影响，造成生产力的扩大和投资行动，忽而积极、忽而慎重...等现象。因此，资本的运动产生了与竞争阶段不同的特征，带来了以垄断资本为顶点的「支配→剥削」的支配制度，其结构性特征在于：资本与劳动各自进行阶层分化，阶级斗争的核心转变为垄断资本的联合体与大型产业劳动者组织之间的对抗等等。在动态方面，则发生产业循环的变貌和经济停滞（庞大而且慢性的过剩资本与过剩劳动力并存）。

但在另一方面则有：以新兴产业的开发和对外扩张为基础的间歇性、飞跃性的发展（也就是停滞和发展的循环交替）；经济矛盾以大恐慌和大战争的型态出现，不断的爆发和暂时性解决，在此一过程中，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和国家矛盾的变化、发展与深化等等。这就是说，「垄断资本主义论」就是有体系的诠释，贯彻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所固有的结构和动态之中的规律性。

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固有的结构和动态，也就是其矛盾和矛盾的表现形式规定了国家介入的方式，同时也进行一定程度的变貌而贯彻到现在。例如，垄断资本主义固有的「停滞化」基调，虽然有国家的大规模介入，却还是顽强的出现；而为了打破「停滞化基调」，促进飞跃性发展的两大手段：开发新兴产业和对外扩张市场，迄今为止还是为发展经济所需。因此，「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论」必须建立在「垄断资本主义理论」的基础上。

3/.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论

二次大战以后的资本主义，是以国家大规模并且经常性地介入经济过程为特征的垄断资本主义，也就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早在1930年代，国家为了对应大萧条所带来的政治与经济危机，就已经开始介入经济过程，并且在二次大战期间，国家更以战时统制经济的型态全面性的介入经济事务，但是上述两者都是属于暂时性的措施，或者其作用仅限于一国的范围内。国家大规模并且经常性的介入经济过程，开始于二次大战后的资本主义。一般来说，国家介入经济过程的方式及影响，有以下几种特征：

(a). 为了避免激化垄断资本主义的内部矛盾而产生危机，必须对劳动者组织进行让步。因此，达成高水平就业与整备社会保障制度，就成为国家政策的中心目标。对资本家而言，相对过剩人口（产业后备军）的存在，是获取利润的不可或缺的条件，所以高水平就业显然违反其利益；同时，保障国民生存权（高福利）的政策也代表着资本主义「自我负责」的原则的大转变。资本家的这些让步，证明了危机的严重性，但也因此，资产阶级经常保持着反扑的念头与行动。

(b). 为了达成高水平就业与景气的上扬的目标，国家以各种金融、财政政策来创造市场并扩大整个经济活动的规模。例如，国家藉由操作利率和货币发行额，来维持物价的稳定和刺激投资；以累进税率和福利制度来进行所得的再分配，以便扩大消费市场；以大型公共工程与军费支出来创造市场等等。

这种创造市场需求的经济政策，为深受不景气和停滞所困扰的资本家带来了获取利润与积累的机会，而颇受欢迎。尤其是以军费支出来创造市场的手段，使垄断企业可以避免与中小企业竞争而容易被采用。

(c). 追求持续性经济成长是最终的政策。因为，一方面为了因应劳动者的要求，必须维持高水

平的就业，并在高就业率的条件下提高生活水平和完善的社会安全保障；另一方面，又要满足资本家获取利润和资本积累的欲求。所以，只有维持经济的持续成长，才能使劳资双方都得到满意。因此不仅要持续采用前项所述的各种手段，也要在安定的国际汇兑、货币和贸易秩序的基础上，扩大贸易、提高生产力、振兴技术发展和创造新兴产业。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体制下的持续性经济成长，容易引发并加速通货膨胀，也可能发生景气过热、成长趋缓甚至负成长的现象。因此，政策执行者必须经常留意可能导致经济成长不安定化的各种情况发生，诸如：通货膨胀等。（所以，北原氏反对大内力氏，在其「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论」中所说的：「以恢复景气、提高通货膨胀率和降低实质工资」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政策核心的主张。）

垄断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由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所采行的各种政策，而获得缓和或抑制。但是，在另一方面却也会使矛盾深化或多样化，甚至出现新的矛盾而产生摩擦。因此，总合性地掌握上述各种政策与制度的特征，以及在那种条件下各个矛盾的运动方式并将其理论化，就是新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论」。掌握由于国家介入的经常化所规定的时代特征，并进一步建构新的理论论述，是可行而且必要的。

(2)冷战下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在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以美、苏两个超级军事大国为首的「冷战体制」的形成，才确立下来。因此，其内容也由冷战的变迁所规定。

二次大战后的资本主义并非单纯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而是基本上由冷战所规定的，可以说是「冷战下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不考虑冷战这个条件及其规定性，就无法分析现代资本主义。

「冷战体制」和其主要的规定如下：

1/以美国为首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联盟」的形成：

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资本主义世界以拥有巨大生产力和军事力的美国为中心进行对苏联集团冷战。美国以外的资本主义国家，则或多或少在从属于美国的意志之下，施行本国的国内政策。这种情形在性质上，有别于战前各个自主主权的国族国家（Nation State），以列强的身份所形成的帝国主义对立。因此，虽然同样称之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却完全不同于二次大战之前以独立的主权国家介入本国经济的情形。

以美国为盟主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联盟」，为了进行冷战，为了协调和调整资本主义阵营的各种利害关系，构筑了国际货币基金会(IMF)和关税贸易总协议(GATT)，以进行对开发中国家的支配和援助。

2/提高军事角色的比重：

在世界规模的冷战时期，为了体制的存亡必须保持庞大的军事力量。因此，与军事相关的部门，通常在财政和生产方面占有相当的比率；先进的军事技术开发政策，对技术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美国庞大的对外军事支出、对外援助以及在「热战」（韩战、越战）时期的巨大开支等。

3/在国内，不得不致力于推行「让步政策」：

在冷战的压力下，为了巩固资本主义体制，将劳工阶级纳入体制内并削弱社会主义势力，必须强化其高就业率政策以及整备和扩充社会保障制度。

4/必须维持「持续性成长政策」：

为了避免内部矛盾激化而产生危机，必须对劳工阶级做出让步，同时为了庞大的军事支出以及对外援助，必须动员所有可能的政策，强力推行持续性经济成长。就二次大战后的持续性经济成长而言，由于：

◎美国所主导的国际协调体制(IMF、GATT)的形成；

◎各国政府在国际协调体制的基础上的成长政策（包括技术政策、产业政策和预防经济过热的政策等等）；

◎以美国为主的技术革新（新的生产方法、新产品和新产业）和美国生活方式（大量生产、大量消费）的世界性普及；

- ◎巨大的垄断资本（尤其是美国的跨国公司）的资本输出和先进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的飞跃性扩大；
- ◎由于美国的对外军事支出和对外援助，导致美元的世界性扩散。

上述因素的作用，扩大了投资、生产、就业、工资和消费的相互依存性，而这种依存性便是以「持续性经济成长」的型态现实化。亦即，持续性经济成长是这些因素总合作用的结果。

因此，持续性经济成长的破绽及随之而来的严重停滞，也可由此观点来进行分析：

(a). 支持持续性经济成长的国际架构的崩溃和美国地位的下降：

由于进行耗费颇大的冷战体系，加上日本、德国的迅速发展，降低了美国国内产业的国际竞争力（71年以后，美国的国际贸易收支出现赤字），因此美国发生国际收支危机，片面终止黄金 / 美元的兑换，导致战后IMF体制的崩溃。此后由于美国产业衰退的深化，产生经常帐赤字和财政赤字的常态化和庞大化，逼使美国减少对世界的美元扩散。

(b). 支持成长的技术革新及其普及化告一段落，而划时代的新技术和新产品也开始枯竭。因此由于新兴产业所带来扩大市场的作用也日渐趋缓。

(c). 先进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不再扩大；

(d). 由于上述原因，以工资上升作为契机而发生经济成长的破绽。因此，垄断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经济停滞，就以比国家垄断资本体制确立之前，更加严重、更具持续性的方式显现出来。也就是说，垄断企业所无法处理的资本过剩和产能过剩的特质，由于国家实行经济恐慌的预防政策而更加恶化。

(e). 针对停滞基调的出现而实施的各种应变措施，不仅无效而且产生新的矛盾。例如，停止黄金 / 美元的兑换之后，由美国开始实施的刺激景气政策，加速了通货膨胀并波及到世界其它国家和地区。美国因此改采抑制总需求的政策，却导致景气低迷并造成中东产油国家，为了因应通货膨胀和美元贬值而提高油价，因而出现石油危机；由于先进国家的再生产机制受到搅乱，而引发'74~'75年的不景气，出现了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并存的现象，也就是出现了Stagflation(停滞stagnation + 通货膨胀inflation)。

80年代里根政府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就因应着这种情况而出现，那就是：一方面，高唱「强大的美国」的复活，挑起和苏联之间的核子、飞弹军备竞赛，引诱苏联消耗国力使其陷入崩溃局面；另一方面，以强势镇压来削弱劳工组织的力量，削减冷战期间所扩大的资本负担（即，高就业、社会保障、对大型垄断资本的规制和税赋、对高所得者的累进税和财政赤字等）。

虽然里根政府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抑制了通货膨胀并且带来了暂时性的经济复苏，但也带来了不正常的利率上升和美元升值，导致美国的经常帐赤字和财政赤字更加庞大化。

不仅如此，由于新自由主义政策放松经济管制和推行金融自由化，引发在经济停滞下的投机性交易的庞大化、国际货币和证券市场的混乱化。影响所及，不仅是美国的国内经济，也把整个世界经济拖入停滞和混乱的深渊里。

(3). 「后冷战」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重新整编

在「后冷战」的新形势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进入重新整编、重新建构的过程。

1/. 在「后冷战」的新形势下，资本主义各国之间需要强化和维持协调体制，因而要求建构一个安定的世界秩序。也就是说，为了克服经济停滞和失业问题，也为了重现持续性的经济成长，需要再建构一个安定的世界秩序——如，国际货币管理制度、国际不均衡调整机构、抑制国际投机的机构等等。同时，更由于下列的原因，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必须强化协调机制：

(a). 以信息革新(Multimedia和internet等)为中心的，资本、信息、技术、劳务的国际性流动，也就是所谓的资本全球化(Globalization)，正在加强世界的统一性以及进行世界范围上的劳动社会化；

(b). 推进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集团的资本主义化。

2/. 冷战的结束，可以减少美国庞大的对外军事支出和对外援助，但是由于产 / 军复合体的反

对和担心失业率的上升，不易大幅度的削减军力。再者，为了调整以及压抑在「后冷战」下频繁发生的地区间、民族间、宗教间的纷争，美国需要各国的协力性军事介入以及分摊军事费用。因此，就整个世界而言，军事支出似乎暂时不可能有大幅度的缩减。

3/.由于冷战的结束，减少了「国内让步」的必要性。劳工组织在持续性经济成长的过程中被体制统合后，又在里根主义、詹契尔主义的强势镇压下被弱化。所以，社会福利预算的削减以及因为企业重建而解雇劳工，就成为必然的趋势。

4/.为重视持续性成长，各国之间互相协调，准备根据「垄断资本主义的理论」中所提到的两个方向，以财政、金融政策促进成长。

(a).依据新技术、新产业的经济开发，如美国政府的信息革命促进政策；

(b).依据对外扩张的发展——促进以亚洲为中心的非资本主义地区的资本主义化，来发展本国经济。

朝向这两个方向的经济政策，能否获得成功还有待观察。说不定反而会引发先进国家内部的产业空洞化，导致停滞和失业问题的解决更加困难；也有可能引发先进国家之间或是先进国家与新兴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对立；更有可能由于地球的温室效应以及对环境生态的破坏而受阻。

就整体而言，上述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重建方向和内容，是希望以建构非经济性的公权力并以其介入经济为手段，所以基本上还是呈显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特征。

六、伊藤诚：「资本主义逆流假设」

现代的马克思经济学(1988)

资本主义经济的理论(1989)

资本主义的逆流(1990)

马克思的逆袭(合着1996)

进化中的资本主义（合着1999）

现代资本主义的Dynamism(合着1999)

(1).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论和高度成长的崩溃

A.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论的局限性

一般地说，在1973年以前，作为马克思学派的主流论述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论」，事实上是承认凯恩斯干预政策的有效性，并将其作为战后高成长期的特征而予以理论化。也就是说，承认国家为了经济成长所采取的财政、金融政策的有效性，因而缓和了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经济停滞的趋势，形成了持续性经济成长的资本主义体制。

但是这些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论，对于资本主义在此一时期之所以能够进行持续性成长的历史条件和契机，大都没有进行具体的考察，因此也就无法洞察该体制必将遇到瓶颈的必然性。其实，战后的高度成长，是在「战时动员体制」打破了垄断资本主义因限制投资所导致的经济停滞趋势，然后，再从「战时动员体制」转变为战后的「冷战体制」的历史契机和架构下，才得以发展。

从美国巨额的军事支出可以得知，国家的财政、金融政策并非单纯的景气政策，而是在冷战架构下，因应着情势的变化而随时发动的。

但是，我们也不可以忽视，导致战后资本主义在60年代之所以能够继续其高度成长的基本条件：

1.美国藉由其先进的产业技术和国际竞争力成为经济霸权，进而保证黄金 / 美元的兑换比率

（1盎司黄金等于35美元）以及在他的支持下所确立的布列登森林（Bretton Woods）国际货币体制（规定国际货币的固定汇率）。这种国际货币体系的维持，抑制了各国通货膨胀的恶化。只要美国的农、工业能够维持其强大的国际竞争力，庞大的政治性、军事性美元扩散就能够促进资本主义先进国家的经济复苏和成长，而且反过来又可以促进美国经济和外销的成

长。

2.美国所主导的产业技术的开发和利用（包括在冷战下加速发展军事技术的派生效应），相继带来了各种耐久性消费财的大量生产，并波及到其它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实现了一连串的产业升级。以耐久性消费财（家用电器、汽车等）为中心，领导战后高度成长的资本密集型设备投资，必须以先进国家劳动者购买力的增加、产生对耐久性消费财的有效需求为前提，才得以继续成长。所以透过「冷战体制」下劳资关系的调整，调节学派（RT）所强调的：透过「福特主义」向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扩散，耐久性消费财国内市场的扩大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3.在高度成长的过程中，第三世界以石油为主的原料产品有弹性的继续供给（尤其是由于中东油田的大量开发，1 barral [42 gallon] = 1 USD 的廉价石油供给），对于重耗能产业及其消费结构的形成，提供极为重要的基础。

4.由于军人退役、农村的过剩劳动力、劳动力的国际流动、以及女性的劳动力化等因素，使企业享有充足的廉价劳力，因此先进国家的工业积累得以顺利进行。

B、国家对经济的介入和福特主义

在上述基础条件存在的前提下，资本主义世界的货币管理制度，一方面可以弹性的运用通货膨胀政策来刺激成长（如，抑制实质利率的提高，对公路、港口等基础设施的公共投资等）；另一方面，则在Bretton Woods国际货币体制之下，将先进国家的通货膨胀抑制在温和的水平。

总之，此一时期的高度成长，是从「冷战体制下，以美国为中心的国家对复兴的援助、军事支出对有效需求的效应，以及包括这些在内的，由上发动的凯恩斯主义式的景气、就业管理」，逐渐转变为「主要依靠劳资分配关系的调整而从下扩大有效需求的『自律性资本积累体制』」而形成的。

由此可见，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论和福特主义论（如RT派）都只是主张导致成长的片面因素，而忽略了其它的因素的作用，而且也没有注意到各种因素的重要性，因不同时期而有所变化的情形。因此，在分析现代资本主义时，应该注意到资本主义发展的各个阶段的主导性产业和产业技术的特性，以及其成长的具体条件。如此，方能更准确的掌握这段时期资本主义高度成长的历史特性及其变化。

C.高度成长的瓶颈

这个时期，在进行资本积累的过程中，高度成长的基础条件逐渐趋于消失。首先，由于先进国家之的不均衡发展，美国逐渐丧失其经济霸权的地位。在1970年，美国的贸易收支从黑字转为赤字，其国际收支也因为庞大的军事支出以及跨国资本的对外输出，出现大幅度的逆转，导致BrettonWoods国际货币体制崩溃。同时，在这个过程中，在国际上由于通货和信用膨胀，激化了通货膨胀。加之，在现有产业的内部，技术革新的速度开始减退，相对于一次产业产品和劳动力的供给余力而言，资本积累已经过剩化。因此，原料价格与实质工资的提高超过了生产力的提升，造成利润率下降（根据，A.Glyn的分析，1973年，七大主要工业国家的利润率已经下降20%）。

(2). 现代资本主义危机和历史发展趋势的逆流

A. 危机的特征

从1973年以后持续至今的世界资本主义危机，造成物价走向、一次产业产品的相对价格、金融资本的角色、经济政策的基本方针等等，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这个过程中，虽

然也有过几次景气复苏的局面，但就整体而言，诸如：高失业率、经济停滞、经济活动不安定以及企业破产的增加等危机性困局，至今都还存在。

这种情形似乎可以称为，继19世纪末的大萧条、1930年代的大恐慌以来，资本主义历史上的第三次大萧条。根据联合国国际劳工局（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 ILO）的报告指出：在1994年初，全世界不充分就业人口就大约有8亿2千万人，占有所有劳动人口的30%。

这个大萧条是以资本主义国家为中心持续进行，表现在：因1973年的通货膨胀危机而引起的再生产萎缩；随后因信息技术提高劳动生产力，而造成对过剩固定资本的压力；由于实质工资的停滞而减少消费需求；因内外竞争压力使利润率难以上升；国家财政出现破绽、汇兑市场的不安定、产业空洞化趋势；投机性泡沫经济和其崩溃的打击...等现象。在这个过程中，由金融资本所操控的垄断组织，并没有像过去一样出现为了维持价格政策，而抑制或收缩生产规模因而深化经济困境的情况。这一点，明显与1930年代的大恐慌有所不同。因此，所谓「垄断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停滞趋势」的说法是否恰当，似乎值得怀疑。其实，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由于资本主义动态的变化而产生的。即，针对萧条的经济重编，是以资本主义世界ME（Microelectronics）技术相继高度发展与普及为基础。因此，现代资本主义出现了很显著的再强化个人主义性、竞争性市场原理的倾向。那就是：

- 1.投资变成轻薄短小化、自动化，企业能够以较少的投资来提高生产力，扩大了母公司、工厂、各地营业部门的场地的选择范围；
- 2.耐久性消费财的大量生产体制，也由于计算机管理而进行多样化、弹性化生产。同样的趋势，也在商业和服务业发生。因此在消费生活和市场经济上，强化了个人主义色彩。
- 3.随着工厂自动化（FA）、办公室自动化（OA）的普及，增加了不熟练劳动者的雇佣量（如，计时劳动者）。因此，企业可以弹性的调整雇佣人数和工资成本。也因为如此，过去以具有经验和技能熟练度的成年男性的正式员工为主所组织起来的工会，其组织率日渐降低，从而降低了对企业及政府进行交涉的能力及其社会地位。于是在劳动力市场也贯彻了个人主义市场经济的竞争原理。
- 4.由于信息技术的发展而被迫进一步进行跨国化的企业，不断增加其跨国境的活动能力和国际竞争力。

B. 新自由主义的现实基础

在1973年的萧条的过程中，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由于深化了国家财政危机和通货膨胀而失势。因此，以1979年上台的撒切尔政权作为开端，各个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政策潮流相继转向为新自由主义。

新自由主义政策，主张：缩小国家在经济上所扮演的角色；减轻富裕阶级的税务负担；放宽各种经济规制；进行公营企业民营化等等。打击了在公营事业拥有战斗传统的劳工运动，广泛的促进了以个人主义市场原理为基础的经济再活化。也就是说，由于资本主义经济高度的采用信息科技，引发竞争性市场经济的再活化，这就形成了站在个人主义立场上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潮流的物质基础。因此，新自由主义政策可以说是符合现实基础而不能简单的称之为Anachronism（时代错误）的政策。

由此可见，以资本主义经济的现实变化为基础而转变为新自由主义的趋向，并非只是在高度成长时期具有高度声望的凯恩斯主义的挫折而产生的反动而已。回顾19世纪末大萧条之后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

- 1.重化工业成为主导性产业并使设备投资成为「重厚长大」化，形成并且扩大了金融资本的垄断组织。
- 2.这种情况，带来了以大量受雇于大规模工厂、具有技术熟练度和经验的成年男性劳工为中心

的工会运动的成长。

3.国家增大其调节或缓和劳资对立的角色。

由于这些原因，强化了社会制约「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自由竞争原理」的发展趋势。俄罗斯革命之后，资本主义国家为了要对抗国内、外社会主义势力的成长，纷纷采取军国主义政策、劳资同权化、福利国家化、冷战体制和凯恩斯主义雇佣政策等措施，更加促进了这个趋势。所谓「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论」，就是针对这种发展形势的理论表现。

C.资本主义的逆流——「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自由竞争原理」的重现

20世纪末所发生的经济不景气尚在持续中。资本主义经济因采用高度的信息技术而产生竞争机制的再活化，使得自19世纪末以降近百年来的资本主义发展趋势，产生了新的「逆流」——投资单位的轻薄短小化、工会的弱化、缩减国家在经济上的角色等等，因而强化了资本主义经济原理依附在竞争性市场机制，才能显现出来的本来面貌。所谓「资本主义逆流假设」，就是用于分析资本主义在1973年以后所呈现的新的面貌的「中介理论」。

除了资本主义先进国家的市场经济重新活化其竞争机制之外，苏联式社会主义的危机和崩溃、以及随后在东欧与前苏联各国进行的市场经济转轨、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走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加上亚洲各国的经济成长等等，使建立在竞争性市场经济上的资本主义，扩大其发展空间。因此在资本主义各国的内部，也正在削减为了对抗社会主义而支付的负担，以及对劳工的让步。所以，资本主义各国由于竞争性市场经济的作用，正在显著的扩大人民在经济、社会生活上的不公平和不公正。

站在个人主义的立场上、以私人资本追求利益的自由为第一优先的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其竞争性活力的再生路线，是朝向对人类和对自然破坏性荒废作用的方向前进。现代资本主义所显现出来的，对人类和自然的荒废作用，是把近代资本主义从其萌芽、发展的全部过程中一直存在的基本局限，以现代的型态展现出来而已，并不是属于资本主义最近的特性。

因此，我们是似乎需要回到马克思的原点，从现代的观点来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原理、作用及其局限性，再进行一次有深度的批判性考察，使其能够用在现状分析上。这就是说，「资本论」的灵活运用，是分析现代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基准。如此，一方面，我们可以避免因为过度强调资本主义发展的一般性规律，而犯了教条主义的毛病；另一方面，也可以避免因为一昧的着眼于一时、一地的特殊性规律，而犯了机会主义或修正主义的错误。

（全文完）

上一篇文章：温特制：美国新经济与全球产业重组的微观基础(黄卫平 朱文晖)

下一篇文章：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方式演变的研究及其现实意义(高峰教授访谈)